

“党员在哪儿都是党员”



■李洪兴

不久前,去陕北老区体验生活,同当地一个村党支部书记交流时,他说,“党员在哪儿都是党员,不管是在村里当个农民还是出去打工,都要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。”一名共产党员能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,才是真正的不忘初心。

党员,是一种身份的认定。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,拥护党的纲领……”当面向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时,短短几分钟完成了从普通群众向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转变。这种颇具仪式感的认定,仅仅是对“党员”二字认同的开始。换言之,需要知道“我是谁”,还

远远不够。

回眸党的历史,老一辈革命家践行着党员的知行合一。谢觉哉从秀才到党员,坚信“我已以身许党”;罗瑞卿虽身处险境,也“宁可冻死饿死,绝不背离共产党”;漆鲁鱼“行乞”万里寻党,身处困境心不变……这里有对理想的坚定不移,也是对成为党员并做好党员的承诺。上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,周恩来提醒身边工作人员,“在党内活动时我是一个普通党员”,就是要让人记住“第一身份”。

时代在变,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始终如一,但“身份麻痹”“意识放空”不时出现,就像不少落马干部在忏悔录中说到的,“忘记了自己的党员身份”。其实何止于此,有些干部违纪违法时不觉自己是党员;有些干部在交党费时才知自己是党员;有些干部在开民主生活会时像一名党员;有些干部在“组织圈”内是党员,在“朋友圈”“生活圈”就失去党员本色……凡此种种,身份的飘忽不定,

让人很难不质疑他们是否还有入党时的热切,是否记得宣誓时的承诺,是否坚守作为党员的行为标准。

地域可以流动,职务可以变动,职级可以调动,但党员的身份始终不动。不管身处何地、身居何位,都理应“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,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,做到忠诚于组织,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”。那些时而清醒时而糊涂、时而自我要求紧一些时而自我约束松一些的党员,工作不扎实、为人不老实、作风不务实,职位显赫至周永康、官阶低微如马超群,都在权色诱惑面前失矩了。

身份与自我是一体两面,认同什么样的身份就能塑造出什么样的自我。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有特定角色,社会心理学认为,角色是社会对个人职能的划分,它指出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社会关系的联系位置,也代表了每个人的身份。让党员有党员样儿,才能获得“同一感的坚强”。否则,党员缺

乏对身份的基本认同,缺少身份意识,很容易滑向深渊。

党员组成了一个政党,党员形象代表着政党形象,党员认同凝结着对政党的认同,党员的日常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政党的日常。我们常说,维护党的形象是党员的责任,而这就应该从党员维护自己的形象开始。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党员杨正道,17 岁参加革命,一颗红心跟党走,至今珍藏着党组织颁发的《共产党员形象录》,94 岁高龄,一生都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,以红色传统教育子女。也正是这些以身作则、自省自律的老党员们在无形中传承着党的优良作风,给党旗涂抹着亮色。

“吾日三省吾身,为人谋而不忠乎?与朋友交而不信乎?传而不习乎?”古人常以此自省。作为一名共产党员,多问一句“我是谁?是什么样的人?”如是,把无形的存在变成有形的彰显,党员之为党员才能成为一辈子的坚守。

画中有话

“换”

2015 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,2016 年要抓好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、降成本、补短板五大任务。专家认为,去产能和去杠杆在本质上就是要打破“僵尸企业”预算的软约束,要求产业根据市场经济原则配置资源。 新华社发



拼酒不是文化

据媒体报道,近日,在海南文昌一场婚礼上,28 岁的伴娘杨某因酒精中毒身亡。此事引起媒体广泛关注,也在互联网朋友圈上被“刷屏”,引发激烈讨论。

有人说,推杯换盏中,伴娘醉酒身亡,喜事变成丧事,这具有偶然性。婚嫁酒宴几乎每天都有人办,并不是所有伴娘都会这样拼,也不是所有宾客都会这样劝酒,有的人即便酩酊大醉也不见得有殒命之虞。伴娘醉亡毕竟是小概率事件,不具备典型性。

但更多的人借此批评国人的劝酒习惯,批评当下不文明的婚俗以及一些地方盛行的酒桌文化。这些批评都具有很强的“角度性”——单凭“伴娘之死”等小概率事件,并不

足以有力支撑批评的论点。但这并不妨碍如此多种角度批评和反思的必要性。生命宝贵,每一个生命的非正常死亡,都应该引起人们的追问和反思,这是一种尊重生命的态度。

事实上,很多引发广泛关注的悲剧事件都有这样的特点,即偶然事件中夹杂着必然。多重看似不充分原因的叠加,就可能击垮一个人的身心承受力。人已逝去,尽管“批评的靶心”不明朗,但并不妨碍人们展开不同角度的思考:如果涉事各方都能够做得更好一些、更人性化一些,惨剧可能就不会发生。

不同角度的批评和反思,有共同的伦理底色,那就是“悲悯每一个生命的猝然离去”。它们看起来莫衷一是,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指向,那

就是“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度发生”。批评和反思除了发人警醒,往往还能推动人们对号入座、反求诸己,并且从自身开始有所改进,比如生活中习惯劝酒的收敛些,经常拼酒的平和些,请客的对来宾保护和照顾得更周到些。

社会悲剧面前,个体不妨多些“行有不得,反求诸己”的反思精神。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多一点“王无罪岁,斯天下之民至”的责任意识,主动检查和反思自身的不足,全力捍卫每一个生命的尊严。整个社会也不妨参与到类似事件的讨论中来,努力形成改进的共识。批评和反思不够科学稳妥也不要紧,怕就怕人们对生命的非正常死亡熟视无睹。

(摘自《光明日报》)

到农村创业 少些“想当然”

■王浩

一位朋友想到农村创业,他在城市打拼多年积累了不少经验,觉得应该不是难事。但咨询一圈却打了退堂鼓,“经营模式、资金、物流、市场等都是绕不过的坎,农村创业难题甚至比在城市创业还要多。”

类似这样的“想不到”还有很多。有人感慨,不同于城里火热的网购,农民互联网使用不熟练,产品推广难度不小;有人发愁,农村急缺懂市场、有技术的新型人才,电商下乡遭遇困境……实际上,农村创业并非易事,千万不要“想当然”,否则就会遇到“想不到”的困难。

这些年惠农政策越来越好,“三农”发展势头不错,志在四方的大学生、怀揣乡愁的企业家、倦鸟归林的农民工,纷纷来抢占农业“风口”。据农业部统计,全国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超过 480 万,各地农民工和大学生返乡创业人数年均增幅保持在两位数左右。他们有文化、懂技术、会经营,为农村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。有的用科学理念转变传统方式,实现农业提质增效;有的瞄准农民“卖难”痛点,用一根网线对接产销,促进农民增收;有的寻求农村新业态的空白点,开发农业多种功能,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。

创业热情难免遭遇现实考验。不少跨界农业的创业者自称新农人,“新”除了身份外,也意味经验欠缺,对农村农民了解较少。从现实看,农业是与生命体打交道的行业,生产周期长、风险大;农村的基础设施欠账较多,公共服务水平较低;农民接受新事物需要时间较长。从创业者动机看,有的因在城市发展不顺,想换个环境;有的不懂农业规律,急于获取短期收益。以这样的动机创业,很难不“碰钉子”。再从农村创业环境看,优质农产品的市场前景好,但储存、物流等瓶颈依然不畅通;特色农产品行情不错,但农民契约意识依旧淡薄,上游风险难以把控。这些难题的形成,非一日之寒。面对农村创业的门槛,在热情高涨的同时,更需要冷静的头脑、平静的心情,做好迎接困难的充分准备。

从城市回到乡村,从其他产业跨界农业,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、市场形态和人际关系,创业者关键要认清自身,找准定位。先将自身实力与农业创业的要求比对,确定能否迈过“门槛”,切勿盲目冲动。即便下定决心,工商资本、返乡农民工、青年学生、传统农民等不同创业主体的情况不同,应从自身的资金、技术等实力出发,寻找合适的创业项目,不应一味贪大求快。

对那些有意愿、有能力的创业者,政府不能缺位,不能让创业的门槛成为成功路上的梗阻。加强培训势在必行,应尽快帮各类创业主体“补课”。扶持政策要更加精准,同样是资金难题,传统农民缺乏抵押物,青年学生缺乏启动资金,农业企业融资渠道单一,扶持政策应精准对接不同群体的需求,从“一刀切”“一锅烩”变成定制式、跟踪式服务,保证优惠政策能够精准地落地。政府也应避免从产到销一条龙式的大包大揽,而是通过营造良好环境,让农村创业健康持续地发展。

优秀人才到农村创业,有助于促进各种资源要素流入农村,加快补齐农村发展短板。只有让创业者轻松启程、踏实前行,才能让他们在实现个人梦想的同时,也让农村焕发新活力。